

毛泽东密召贺子珍 |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的因由 |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分歧
毛泽东与习仲勋 | 胡耀邦和习仲勋在历史转折关头 |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

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大字本

高层寒暑

历史真相揭秘 政治人物兴衰 焦点事件深析

《作家文摘》/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大字本

高层寒暑

《作家文摘》/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层寒暑 / 《作家文摘》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5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大字本)

ISBN 978-7-5143-2676-5

I. ①高… II. ①作…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 ①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0765号

因时间仓促、发表时间久远等原因, 本书仍有部分作品的作者未能取得联系。

请作者及时与编者联系, 支取为您预留的稿酬。

《作家文摘》编辑部 电话: 010-65001508

高层寒暑 /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出品人 臧永清

策划 张亚丽

编者 《作家文摘》

责任编辑 傅威海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7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3-2676-5

定价 53.00元 (大字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情 谊

- 毛泽东密召贺子珍……002
- 伟人之间：邓小平与毛泽东……015
- 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022
- 毛泽东与习仲勋……027
- 邓小平与聂荣臻：工作与生活的密切往来……032
- 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与王稼祥……036
- 胡耀邦和习仲勋在历史转折关头……042
- 开国三将帅之间……048
- 王震不忘战友情……055
- 毛泽东身边的三大政治秘书……060
- 伍修权搭救王稼祥……067

分 歧

- 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074
- 李立三因何与林彪结怨……081
- 毛泽东与张国焘……086
- 杨尚昆谈“四清”运动中的毛、刘冲突……093
- 毛泽东请彭德怀上庐山……096
- 朱德和他的一家在“文革”中……103
-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近访刘少奇、陶铸的亲属……108
-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分歧……115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前后·····	122
杨勇将军在“文革”中与江青的斗争·····	127
毛泽东对周扬的两次批评·····	133
王稼祥搬出中南海·····	138
耿飚三拒江青·····	145
柳亚子和周恩来之间的“疙瘩”·····	150

困 境

毛泽东的晚年困境·····	156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的因由·····	160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日子·····	166
朱德元帅最后的军礼·····	170
1959：庐山会议上周恩来的两难处境·····	177
宋庆龄的晚年之痛·····	183
贺龙的最后岁月·····	188
杨成武闯入毛泽东与林彪的夹缝·····	193
洪学智回忆：因“彭德怀问题”受牵连·····	198
周恩来劝和项英、叶挺·····	201
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	205
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 10 个月·····	210
庐山会议后蒙冤的开国四将·····	216

变 化

毛泽东向刘少奇荐书背后·····	222
博古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22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	230

杨尚昆：违心批判彭德怀·····	235
最后岁月，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	240
林彪为何要打倒罗瑞卿？·····	245
1967 年叶群和江青的关系·····	249
听王光美谈往事·····	252
萧克“上书”彭德怀之后·····	259
海军副司令陶勇预感要上“风波亭”·····	262

情 谊

毛泽东密召贺子珍

· 水 静 ·

一辆黑色吉姆径直驶进一八〇院子，缓缓地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主席贴身卫士封耀松，为我们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贺子珍。我利索地跳下车，与小封一左一右地把大姐搀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主席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主席的卧室。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小封送大姐进里间时，我便到值班室稍事休息。

头一回见到的贺子珍

1954年五六月间，尚奎在上海治疗鼻窦炎时，一天下午，有位中年女同志走进病房，尚奎和她非常熟悉，互相热情地问候。随即，尚奎给我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

贺子珍？这个名字好熟悉呀！想了很久才突然记起，这不是毛主席原来的夫人吗？

很早听人说过，她在延安时，就到苏联去了，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那时候知道贺子珍的人不多，私下议论的也很少，就是那些熟知内情的老同志，也

不愿提起这件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是一种忌讳。

送走她之后，我对尚奎说：“这么一个又漂亮又热情的女同志，一个人孤寂伶仃地过日子，多可惜呀。”

尚奎嗯了一声，没有答腔，他不愿讨论一个命运与主席有关的人。

第二年，我从在贺子珍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那里得知，她是1947年回国的，据说，毛主席原来准备让她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但思想上却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1954年9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

经过抢救，不久就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却再也无法恢复。

她感到有人要害她

我再次见到贺子珍的时候，已是1958年的初夏了。这年开春，上海市委派人和江西省委联系，说是贺子珍同志想回江西住一个时期。

5月间，贺子珍从上海到了南昌，住在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洋楼里。她一到，我便陪同尚奎前往她的住处看望。她的情绪不错，说了许多客气话，对省委的安排很满意。因为她是长征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省委副书记待遇，为她配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还是住在上海的时候，贺子珍就患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发。到江西之后，反反复复，发病多次，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复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她的体质也就急骤地衰弱下来。发病时，她疑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发病厉害时，不吃饭、不喝水，别人送来吃的东西，也要埋在树下，怀疑有人在里面下了毒。实在口渴了，就趁身边没人时用手捧自

来水喝。有一回，她竟几天不吃不喝，身边的人慌了手脚，医生也一筹莫展。尚奎非常急，要我去看看她，一定要设法让她吃点东西。

我急急忙忙赶到她家，一看她那样子，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这哪里是我们的贺子珍大姐呀！只见她蓬头垢面，面黄肌瘦，两眼呆滞，木然而坐，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我连喊两声大姐，她只是点点头，一句话也不说。我左劝右说，要她吃点东西，保重身体。她摇摇头，一声不吭。看来，这样磨下去是不会有什麼效果的。怎么办呢？我和她面对面坐了一阵子，脑子不停地转悠，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我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便告辞出来。同时示意她的护士送我出来。

“你想法子让大姐出去走走。”我对护士说，“然后‘无意地’走到我家里来，我们再来劝她吃点东西。”

“我试试看。”护士说。

这位护士很负责任，对大姐也很有感情。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贺子珍果然在护士的陪同下到我家里来了。

我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她，问这问那，也不管她回答不回答。然后似乎不经意地说：“哎呀，大姐，我还没有吃早饭呢，你陪我吃一点好不好？”

见她没有说话，我便让厨师端上饭菜，又把她拉到我对面坐下，使她能看清我的每一个动作。我先盛好自己的饭，再帮她盛一碗；每样菜我都先吃几口，评说几句，再请她吃。她注意到我盛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样样菜我都尝了，这才慢慢地吃了一碗，喝了一碗汤。饭后我又如法炮制，使她喝了半杯茶。尽管我一连吃了两顿早餐，胃部很不好受，但心里挺高兴的。我毕竟使她吃了点东西了。

后来她又发了几次大病，又是几天不吃不喝，有了这次的经验，我便照此办理，效果都还不错。

大姐神经正常时，周身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头脑也清醒，还能回忆起许多往事。不过，谈的时间长了，也会出现恍惚感和眩晕感。所以，我们每次见面时，总是找点轻松的话题说说，而且不会谈得太久……

她就是吴刚捧出的“桂花酒”

贺子珍到江西之后，她的亲生女儿娇娇，多次到南昌来看她。据娇娇说，每次都是主席让她来的，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以示他对她的关切。

有一回，娇娇带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同来看妈妈，看那神态，我估计他可能是娇娇的男朋友。娇娇一来，贺子珍便显得非常高兴，而这一次则似乎有些兴奋。我去看她时，她主动告诉我，那个小伙子叫孔令华，是娇娇的同学。

“他们相爱了很长时间，现在要结婚了。”大姐笑嘻嘻地对我说，“主席写信来，让他们征求我的意见。”

“那是应该的。”我说，“女儿出嫁，不能没有母亲的意见。”

“嘿，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主席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她开心地笑道。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小孔各方面都好，就是有点胃病。”

我说：“那不要紧，在饮食上注意一点，很快就可以治好的。”

“我也这样想。”她点点头说，“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很周到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条件，他不会想不到。”

这件事，又一次说明了主席心中还装着一个贺子珍。

毛主席是个刚毅坚强的人，是不轻易落泪的，但是，为贺子珍就落过两次泪。一次是1937年底，贺子珍执意要去苏联，主席怎么劝说都没有用，终于走了，于是他哭了。另一次是1954年，贺子珍因为在广播中听到他的声音，引爆了在心中积抑多年的思念、痛苦与悲伤，严重损坏了神经系统，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又落泪了。这种眼泪，应该说是一种压缩在心的深层的被液化了的感情。

据我所知，主席曾多次给贺子珍写信，有时贺子珍还亲口告诉我，主席让娇娇带信来了，并且也会谈及信中的某些内容，如嘱咐她治好病、养好身体，征求她对女儿婚姻的意见等等。这些一般听过就算了，但有一回在她身边的一

位近亲告诉我一件事，却使我感触至深。那位近亲说，娇娇每次来南昌，都带了主席的亲笔信，而且信的抬头总是“桂妹”两个字，这是因为贺子珍是在1909年桂花飘香的日子出生的，小名就叫桂花。可以想象，一声桂妹，足以使贺子珍回到几十年前井冈山苍松翠竹所掩映的脉脉柔情之中。由此我又想到毛主席的著名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吴刚捧出桂花酒”句中的“桂花”，是不是贺子珍这枝桂花呢？我想是的。这首词里的杨、柳、桂都是用以喻人的，杨、柳分别指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已为世人所知，但人们却忽略了桂是何人。因为文艺评论家们从未提及，这也许或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贺子珍的小名，或者有碍于江青的忌讳吧。

至于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感情，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在苏联时，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主席已和江青结婚，有的便向她表示自己的爱；当她回国之前，又有人重提此事。她毫不考虑地说：“我一生只爱过一个人，他就是毛主席。不会有第二次爱情了。”

互相思念而又不能相见，显然是十分痛苦的，贺子珍的病，就是这棵扭曲的感情之树的苦果。那么毛主席呢？难道就不难受吗？我曾经对尚奎说：“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尚奎摇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我仔细想了想，尚奎说的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领袖，他的感情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从这一点来说，远不如普通老百姓自由。

然而，毛主席到底也是人，并不是神，而且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他终于决定撇开一切有形无形的障碍，和贺子珍这位曾和他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历史时期的妻子、共同经历了10年峥嵘岁月的战友——尽管现在她已经不是他的夫人——见上一面。

这个使人振奋的消息，是尚奎告诉我的，同时交给我一个不同寻常的任务……

主席亲自授命

“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7月7日中午，尚奎郑重地对我说。

“什么事？怎么这么急？”我问。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尚奎说得很严肃，“毛主席要见她。”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一旦成为事实，又觉得有些突然了。

“啊，这可太好了！”我几乎叫了起来。

“你听我说，”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我大声说话的手势，“这是一个特殊任务，主席强调要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又如此这般地做了许多具体的交代。

下午两点多钟，我便和朱旦华同志一道乘车下山。在车上，我们商量了一下用什么理由请贺子珍上山，并且统一说话的口径，以免节外生枝。因为尚奎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主要是怕她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并且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6点整，我们便到了南昌。车过八一桥，便直向三纬路贺大姐的住所驶去。

大姐恰好在厅堂休息，一见我们进屋，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生活起居之后，我便“言归正传”了。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我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们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大姐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我说，“明天下午3点我们来接你好吗？”

第二天，我们准时把车开到大姐住处。大姐上车后，我们便向庐山飞驰。一路之上，我们和大姐尽谈轻松、高兴的事，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汽车在成

熟中的田野起伏，我们心花怒放。几乎在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庐山牯岭。

按照尚奎事先的安排，我们把车子直接开到特地为大姐准备的住处：涵洞左侧的 28 号房。这里附近只有几幢房子，都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朱旦华已经回到自己的住处，只留下我陪同贺子珍大姐。我们住的房间，摆了两张床，电话、卫生间一应俱全。吃过饭，安排好大姐休息之后，我先给尚奎挂了电话，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尚奎叫我陪着大姐，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我又和主席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主席问道。他好像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我回答说。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主席说。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机会，独自乘尚奎的车，到了 180 号。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汇报了一下，并且告诉主席，大姐情绪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主席点点头说，“今天晚上 9 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我说。

“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说，“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我想起旦华原是毛泽民的夫人，她们之间的感情更亲近些，旦华又同我一起接大姐上山的，便问主席：“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说。

显然，主席很谨慎，想要尽量缩小知情面。一切问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抽着烟，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我不知道主席这句话的内涵，也不敢多问，只是说：“再见，主席！晚上 9 点我一定陪大姐来。”

待我赶回 28 号房时，大姐午睡还未醒。

我很困，但是睡不着，直到我坐在 180 值班室等候大姐时，仍然处在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之中。

“铃、铃、铃……”

清脆的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拽了出来。这是主席召唤小封。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捉摸，也许谈得不错吧，要不怎么这么久呢？人哪，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一会儿，小封把贺大姐扶进值班室，让大姐坐下，然后对我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着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我已经注意到了，在离 28 号不远的河南路，就住了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康生也住在那里。我想，主席考虑问题真周到，连这样一些细微末节都了解到了。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她一步。”我说。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主席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我说。

我很清楚，这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我怎么开这个口呢？大姐是很敏感的，如果说话不当，引起她的怀疑，那就糟了。要是不能从她手里拿下来，后果更为严重，主席睡眠不好，有吃安眠药的习惯，他吃的安眠药是高敏的，如果服用不当，特别是在精神失常的时候，肯定出问题。否则，主席也不会这么着急呀。

从主席房间出来，到陪大姐回住所，我脑子不停地转，可就是想不出一点儿办法。

大姐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睡到床上了还一直说个不停，如果突然插进一个毫不相干的安眠药问题，非得把事办砸不可。于是，我只好在一旁静静地躺着，偶尔说一两个字表示我在听哩。至少她现在还没有想到吃安眠药，真要吃了，我再制止不迟。两张床相隔不过两三尺，彼此的一举一动，互相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她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我不经意地问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她回答说，“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了安眠药，我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不放。

“是呀，主席太忙，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我紧接着说，“尚奎也是这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我像忽然想到似的说：“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大姐待人一向很客气，而且我们之间交往很多，已经建立了感情，所以听我这么一说，马上找出那三瓶安眠药，侧过身递给我，说：“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啊，我还未见过哩。”我接过安眠药，边看边说，然后坐了起来，侧过身去说道：“哎，大姐，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大姐说。

我暗暗地吁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我给小封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

彻夜长谈

大姐给了我安眠药之后，又继续谈下去，从她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

地说了一夜。

“我是1928年在永新和主席结婚的，当时还不满19岁。”

大姐记忆美好的往事时，眼里闪耀着灼灼光华。“不过，我并不是一个对革命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她说，“大革命时期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大姐说，1925年她才16岁时，就参加了“CP”（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就转为“CY”（共产党）。北伐军进驻永新县时，根据党指示，她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以这种身份成为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妇女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永新大批共产党员和农民领袖被捕，她当时正在吉安做妇女工作，于是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同志的组织工作和打开永新县城的武装斗争，后来又亲手击毙了两名攻城的敌人。当反动派纠集大批兵力反扑时，她毅然随宁冈农民自卫军撤到井冈山下的茅坪。她就是在这里头一次见到毛主席的。

自从1927年10月初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区域之后，贺子珍就回到永新做群众工作了，主席“大力经营”永新时，她就经常跟着主席进行调查研究，参加了主席所作的已经丢失了的《永新调查》。他们在工作中逐渐建立了感情，并于1928年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就结婚了。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延安的10年间，尽管戎马倥偬、岁月峥嵘，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像任何一对夫妻一样，也会发生一些争吵，但同样也是吵一回，好一回。那时她年纪轻，任性，但主席一般都不计较，所以都没有什么大的风波。在瑞金期间，主席一度被“左”倾路线排挤，能做的事不多，实际是“靠边站”了。这时她的身体很差，还闹过一次大病，主席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小事情都跟她聊，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

“大姐，你们感情这么好，为什么你要离开主席到苏联去呢？”我不解地问。

她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说道：“那是到延安以后的事了……”

红军长征抵达延安时，全国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延安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内国外的各种人物都纷至沓来，其中还有不少从大城市来的非常洋气的女学生和打扮怪异的外国记者。主席特别繁忙，而她却十分苦恼。延安这地方比井冈山、瑞金的范围大得多，人口也密得多，整天不知他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回